



儒家精神

燕義權 著

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（滬）

儒家精神

增訂本

上海山東中路二九〇號

著者
發行

燕義權

有
不
著
作
權
翻
印

印刷所

源
源
仁
記
印
刷
所

上海安慶路萬祥里九號

電話：四〇八九九號

總經售

中國文化服務社

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

自序

多少年來，朋友們都認爲我是一個適于研究學問的人，我自己亦有一個安心研究學問的理想。不幸國家變亂頻仍，一切都成泡影。近年忙于衣食奔走，更不能安心自修，無暇寫自己的東西固不必提，卽論根底也還是薄弱得很。所以認真來說，雖然十年來寫的也不算少，實還不配談研究學問，尤不配談著書立說。這本書之敢于出版，蓋因確信它頗有裨於當前的世道人心，並非以爲有什麼了不起。老實說，「儒家精神」這本書，只是一種常識的概論，算不得高深的探索。而我最初的動機，原不過要寫一本比較純正進步的修養書，並沒有藉以博取學術地位的意思。因此，我切望讀到這本書的人，不必過分重視它底學術性，而要把它當成修養書。

不過話是要說回來的，我這樣說，並非這本書沒有見解之謂，實則本書雖是一種述學之作，亦非人云亦云，實頗有獨到之處，其中尤以闡述儒家歷史觀爲然。只是見解成

熟與否，還是另一回事。但我願在此提明一句，就是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，雖不敢說是如何的殫精竭思，實已做到了字斟句酌。大概每一個作家，都不免有一點自負的，我這本書是否有其可取之處，非我底主觀所能判斷，而要請教於讀者底客觀評量了。

本書計分三部份：首爲儒家思想基礎，談儒家的史觀，次爲儒家修養理論，談儒家的經典，再次爲儒家精神表現，談儒家的人物。然以儒家典籍之富，學說之廣，人物之衆，區區十萬餘言的本書，自難概括其精神的全貌，然整理舊籍，貴在有識，果能摘英得精，量少自不足病。這裏需要特爲說明者：本書所述之典籍，純屬就書論書，但取其爲儒家崇奉的經典，不計其內容的真僞，本書所述之人物，亦屬就人論人，但取其能表現儒家的精神，不問其思想的純駁。否則求全之毀，荒謬之譏，淺學如我，其何敢辭？同時本書後兩部份，曾用今名在重慶新中國文化社印過一次。前一部份原名「儒家歷史觀」，另加導言，交重慶史學書局印單行本，後因主持人鄭逢源君不幸病逝（鄭君爲青年史學家，殊堪悼惜），書局停業，未成事實。而我年來見解與前亦有不同，乘此合併付印機會，業已詳爲修正。這也是應該附帶說明的。

作爲一個作者心血結晶底著述，其向書局賣版權或抽版稅，在文化日趨商業化的今日，其所受到的委屈和痛苦，實在是不堪言的。這本書能夠自費出版，我不能不引爲大快。不過這得感謝郭炳章任允執兩兄，沒有他們的助力，能否順利出版，還是很難說的。又本書承名畫家李丁隴先生設計封面，在此一併誌謝。

作者 三十七年青年節于滬

儒家精神目錄

自序

緒論

儒家思想基礎

——歷史觀

人爲

禮樂

道德

民心

儒家精神

五

二四

三八

五三

儒家修養理論

經典談

易經	六五
書經	七〇
禮記	七七
論語	八六
大學	九五
中庸	一〇二
孟子	一〇九
荀子	一一八

儒家精神表現

——人物論

范仲淹的志氣	一二五
朱 熹的居敬	一三二
陳 亮的自負	一三九
文天祥的正氣	一四六
王守仁的自信	一五四
張居正的篤實	一六〇
顧炎武的謙冲	一六七
王夫之的艱貞	一七四
顏 元的力行	一八一
曾國藩的好學	一八八

附錄

孔子家語論修養·····	一九七
陳同甫與朱晦庵·····	二〇六

緒論

——我所認識的儒家精神

中國現在是否需要儒家精神？我的答復是肯定的。我覺得儒家別的方面，縱無成就，人生哲學，則絕對有大成就，別的思想縱然落伍，人生哲學，則絕對沒有落伍。它依然合時代需要，依然有崇高價值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它依然可做我們修身行事的準則，安心立命的指針。

歷史哲學爲人生哲學所從出，故闡述儒家修養論，不能不先究明儒家歷史觀。人格爲學養的發露，要證明儒家精神的表現，不能不兼述及儒家的人物。實則著者之意，實在由人生哲學，探求儒家精神。惟本書的歷史觀，實際亦是一種人生觀，本書的人物論，實際亦是一種修養論，名雖有別，義實一貫，無非在闡揚儒家的精神而已。

根據我的體察和研究，所謂儒家精神，蓋具有如下特徵：

一 積極的：儒家教人以「自強不息」去「開物成務」(《易經》)以「兢兢業業」去「克勤克儉」(《書經》)。雖然理想的人格是「中行」，但「不得中行」則「必也狂狷」(《論語》)。而在天下無道之時，更能有責無旁貸之勇：即明知無補大局，亦能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(《論語》)。這就說明儒家尙積極。所以桀溺以爲：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與易之」？孔子却說：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」(《論語》)。至孟子所說：「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，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」(《孟子》)的話，更有斬釘截鐵的堅決。所以他不是消極的，乃是積極的。

二 行動的：儒家教人由「格物」而「致知」(《大學》)，由「擇善固執」而「困知勉行」(《中庸》)。不信天，只信人，不講難，只講爲。這就說明儒家尙行動。所以儒家雖不輕視言與知，而最重視的，却是行。孔子說：「邦有道危言危行；邦無道危行言遜」(《論語》)，言雖可變，行必堅持。荀子說：「不聞不若聞之，聞之不若見之，見之不若行之，學至於行之而止矣」(《荀子》)，知雖是始，行却是成。所以它不是空言的，乃是行動的。

三 實際的：儒家教人崇「剛」貴「質」（論語），「慎獨」，「素行」（中庸），講本末，主實用，愛樸實，重力行，這就說明儒家尚實際。所以雖然野人不如君子，而孔子却說：「先進於禮樂野人也，後進於禮樂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」（論語）。雖然憂患不如安樂，而孟子却說：「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，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」（孟子）。所以它不是浮誇的，乃是實際的。

四 博大的：儒家教人行「恕」，而是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（論語）的恕。行「公」，而是「天下爲公」（禮記）的公。雖重小處着手，亦能大處着眼。雖重實際工夫，亦有遠大理想。這就說明儒家尚博大。所以孔子理想的「聖人」是：「耐（能）以天下爲一家，以中國爲一人」（禮記）。孟子理想的「大丈夫」是：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獨行其道。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（孟子）。所以它不是狹小的，乃是博大的。

五 堅貞的：儒家教人成仁，而是「殺身以成仁」（論語）。取義，而是「捨生而取義」（孟子）。知命，而是「見危授命」（論語）。這就說明儒家尚堅貞。所以雖然習俗

移人，但孔子說：「不曰：堅乎磨而不磷；不曰：白乎涅而不緇」（《論語》）。雖然暴力可畏，但曾子說：「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懼焉？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（《孟子》）。所以它不是柔佞的，乃是堅貞的。

六 樂觀的：儒家教人「樂天知命」（《易經》）以「志於道」（《論語》）。「動心忍性」以「求放心」（《孟子》）。這就說明儒家尚樂觀。所以，雖然大道不易行，但荀子說：「君子無爵而貴，無祿而富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窮處而榮，獨居而樂」（《荀子》）。雖然憂患不易免，但孟子說：「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」（《孟子》）。所以它不是悲觀的，乃是樂觀的。

以上是我所見到的儒家精神，儒家此種精神，爲以往民族文化的傳統，亦今後建國大業的動力，在個人和國家均甚煩悶的今日，是極需要來發揚光大的。

儒家思想基礎

(歷史觀)

人為

人為是儒家的根本觀念

人為是儒家的根本觀念，儒家最相信人類自己，所以理論本於人情，事業基於人倫，修養重在自反，表現貴在行事，儒家眼裏的世界，只有人類，沒有其他，只有實際，沒有幻想。重視人的尊嚴，承認人為宇宙主宰，相信人的力量，知道人能變革歷史行程，所以他是人本主義，更是人為主義。

人在宇宙中的地位，儒家根據天人合一的觀點，是有極高之評價的。書經說：「惟天地萬物父母，惟人萬物之靈」(泰誓)。禮記說。「人者天地之心也」(禮運)。董仲舒說：「天地人，萬物之本也」(春秋繁露)。程伊川說：「一人之心，即天地之心」(仁說)。人既為天地萬物的心靈，當然人就是天地萬物的主宰，人既為天地萬物的主

宰，當然人就是決定一切的力量。所以大之如邦國之安危，小之如個人之禍福，推究其因果關係，蓋無不取決於當事者自己，書經所謂「邦之杌隍曰一人，邦之榮懷，亦尚一人之慶」（秦誓）。孟子所謂「禍福無不自己不之者，詩云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」，這兩段話，就是這個意思最好的說明。

所以人類欲興邦安國，欲趨吉避凶，決沒有其他的門路，只有靠自己的作爲。以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來論，他對人稱述其成就，絕對否認自己是「生而知之」，只承認自己是「好古敏求」，就是此種精神最好的代表。孟子對於此點，尤多反復申論，而對不爲與不能的譬喻，就最精采：「曰：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？曰：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我不能，是誠不能也；爲長者折枝，語人曰我不能，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」。可見所謂「爲」，並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難能，乃是如爲長者折枝之易做。荀子與孟子的人性論雖異，而其「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爲」（性惡）的人爲觀念，亦不外此義。

可見人在宇宙中居於最高的地位，爲是決定歷史人生的關鍵。儒家的信念，就建基

於此，所以我們說人爲是儒家的根本觀念。

天命是不能起作用的

爲什麼儒家能相信人爲？這當然是由儒家對於天命鬼神等的觀念來的。不過關於鬼神的問題，由孔子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」（論語）的話、及論語記他「不語怪力亂神」，不贊成祈禱等事看來，他對鬼神的態度，實在非常冷淡，所以後來儒家，也少談論；偶然提到的如孟子說「聖而不可知之謂神」，荀子說「盡善俠治之謂神」，對於神的看法，成了理想境界的代表。而宋儒對於鬼神的觀念，如程伊川說「鬼神者造化之迹也」（文集），張橫渠說「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」（正蒙），又成了一種自然變化的迹象，都沒有絲毫迷信意味，對世人並無多大影響，實際不足深論：應該深論的，乃是儒家對於天命的觀念。

不過儒家對於天命的觀念，也並無宗教式的迷信，乃另有其一套看法。原來他們之談到天，旨在知天，所以要知天，旨在法天。他們之談到命，旨在知命，所以要知命，

旨在正命。這由古代儒家思想的發展來看，是再明白不過的。

自然像他們——尤其是孔子有些過於強調天與命的權力處，也是頗易啓人迷信念頭的，如論語所記：

王孫賈問曰：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皂何謂也？子曰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子畏於匡，子曰：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

匡人其如予何？

子曰：莫我知也夫！子貢曰：何謂其莫知子也？子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？

司馬牛憂曰：人皆有兄弟我獨無，子夏曰：商聞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

伯牛有疾，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，曰：亡之，命矣夫，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，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

要就以上這些話看來，他們實甚強調天與命的權力：但要就以下這些話來看，當也能明白他們的真意所在：